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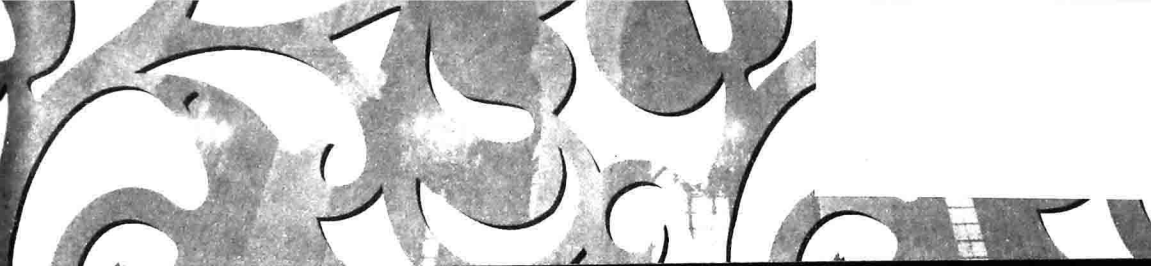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19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新探

► 惠继东 / 著 ◀

SHIJIU SHIJI EGUO ZUOJIA BIXIADE
XIAORENWU XINGXIANGXINT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19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新探

惠继东 / 著

I512.064
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 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新探/惠继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61-5180-8

I. ①1… II. ①惠… III. ①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974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初,将近百年的俄罗斯文坛上,描写小人物形象的作家辈出,作品众多。这些反映小官吏、小职员和底层社会民众生活命运的作品,在整个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正因为如此,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才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大放异彩。

小人物形象诞生于 1830 年,“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是该人物形象系列的开创者。普希金在 1830 年发表的《别尔金小说集》中首次塑造了十四等文官驿站长维林等小人物形象。从此以后,一批在俄罗斯文坛上颇有建树、卓有成就的作家继承了普希金开创的文学传统,相继创作出了一系列小人物形象,形成了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人物画廊中蔚为壮观的艺术群像。小人物形象在俄国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现象,揭示的是文学形象在特定背景下的连环示范效应。

小人物形象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小人物形象主要指“那些被压迫的、被欺凌的、被侮辱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① 人们,包括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前的农奴,改革后的农民,破产的城市平民,以及那些性格复杂的青年思想者。“‘小人物’就社会地位而言,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如破产的农民、劳力、流浪汉、小职员、小官吏、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等平民阶层。‘小人物’之‘小’不仅在于他们地位低下、金钱匮乏——这只是‘小人物’的外在标识;‘小人物’之‘小’,更在于他们精神的卑微、人格的失衡。在精神奴役、经济暴力双重挤压下的低贱生存状

① 李毓榛:《俄国文学十六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4 页。

态中的心灵感受才是‘小人物’的内在特质。”^①

这类小人物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多有所见。作家着重通过对小人物形象复杂性格的刻画，通过对他们的痛苦挣扎和不懈抗争精神的再现来塑造他们的形象，从而展示该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人本主义精神特质。

狭义的小人物形象主要指 19 世纪俄罗斯公务员阶层中的一些小官吏和小职员。这一社会群体并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有固定的职业，收入虽然微薄，却比较稳定，基本上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在温饱线上徘徊。这种经济状况和身份定位使他们在公务员阶层中地位低下、身份卑微，成为人们取笑和羞辱的对象。这类小人物形象在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艺术刻画。一般来说这几位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小人物形象。

小人物形象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典型，是现实生活中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生存现状的艺术概括。小人物形象作为生命个体，都是个别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他们不能左右历史。他们不是那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大人物，而是迥异于大人物、英雄、胜利者的形象，同时“他们也不是单纯的炮灰或棋子”，尽管他们在某些人的眼里仍是一块“抹布”。他们作为 19 世纪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一类特殊人物形象，其性格特点具有某种过渡的痕迹，即他们面临着传统和现代的双重选择，在这个选择过程中，他们难免遗失和丢弃许多属于自己的东西，导致其生命价值被忽略、被漠视。小人物形象作为悲剧形象，其命运未经作者刻画揭示之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让人不以为悲，虽然他们比那些大人物离我们常人更近。小人物形象的可贵之处在于对那些平凡的生命进行了人性化揭示，即作者把小人物形象当作一个在具体背景和特定环境下生存的普通人予以观照。由于历史原因和个人性格因素，他们未能成为自我命运的主宰者，而沦为了对历史、对社会都无足轻重的角色，但作者并没有轻视这些无足轻重的生命，而是对其生命价值给予足够的认同。在小人物形象中寄寓了作者深沉的话语言说。

^① 刘研：《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5 页。

小人物形象既是一个文学概念，又是一个文化和历史概念，它承载着作家对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阶层——小官吏、小职员、底层社会民众的心理动态和行为方式的独特言说。小人物形象的深层意义揭示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文化变革和阵痛，传递的信息是社会与人性的矛盾对立而引发的危机意识。因此，体现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意识、反思和批判意识、自我确认困惑与人性恶的否定意识，以及宗教弥赛亚意识，就成为小人物形象关注的焦点。

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始终是小人物形象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这个主题的深刻性是把对人本主义的追寻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结合起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物形象实际上承担了颠覆现实、超越现实和改造现实的任务。为了实现对人本主义精神的追寻，小人物形象的作者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下层社会，通过小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那种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摄取社会现状、关注那些被公众舆论所忽视的隐性事实的传统得以恢复。小人物形象体现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是以下层社会民众的心态和精神状况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这种自下的观察角度既奠定了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成就了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

小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在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是一种普遍的精神力量源泉，是一种存在于作家内心深处的文化情结。翻开几位描写小人物形象的代表作家的作品，那种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普希金把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反思结合起来，以“强调人的责任”意识作为其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果戈理借助“含泪的笑”的艺术风格，把基督教的宽恕和友爱精神融入小人物形象之中，以“强调此时此地”和“彼岸世界”的联系，作为其人本主义的终极归宿；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话”和“复调”形式，从“个体的现象学”角度让小人物进行自我剖析，并克服自己暂时遇到的困境，以此凸显其人本主义理念；契诃夫通过对小人物的权力崇拜意识以及生活目标渺小等庸俗习气的针砭，以此阐明只有“永远地寻求发展”，才能实现“人的成长”和“自我完善”，进而突出其人本主义特点。

对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追寻是特定时代作家思想观念、文化背景和历史境遇等因素凝聚成的精神结晶。从作家的思想观念看,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总体被拒绝于统治阶层之外,这使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具备了向下看的意识,能体察到下层民众的疾苦,有一种改变小人物悲惨境遇的善良愿望,于是借助小人物形象彰显其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思想观念,便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从俄罗斯的文化背景看,随着 19 世纪初“十二月党人”所倡导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以及 19 世纪中叶农奴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个体意识和公民意识悄然兴起。这种背景下,文学作品表达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诉求便成为呼应现实的具体体现。

从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境遇看,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历史文化潜移默化地渗入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创作心理的产物,而且也是小人物漫长而无望的苦难历程在作家笔端留下的文学烙印。早在 18 世纪卡拉姆辛的创作中,就已经显露出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的端倪,他通过关注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来彰显其人本主义理念,不过,他还没有创作出典型环境中的小人物形象。但是,到了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的小人物形象则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典型,这是因为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在这些作家的生命体验中也感同身受。因此,小人物的命运遭际、人生轨迹必然加深作家内在的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意识,使他们在执笔运思中对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尤其关注。

反思和批判意识在小人物形象刻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家具有很强的理性意识,他们并不一味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小人物给予盲目同情,而是在同情的同时对其思想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尤其是对存在于小人物身上固有的因循守旧、奴性心理、懦弱性格、臣民意识、趋炎附势、权力崇拜等思想缺憾和行为弊端进行了沉痛反思。其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反思的意图是为小人物寻找一条生存发展之路。

对小人物形象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反思体现了作者执着的叩问精神。小人物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存境遇?是接受现实默默忍受,还是在抗

争、呼唤中道出心中的不平和愁怨，进而赢得社会的理解和生命的尊严？在这种发自心灵深渊的追问中，托出了一种严酷的、深层的、令人无法回避的真实，它融会贯穿于小人物形象的整个情节结构中。小人物形象的特殊意义是对类似于思想禁忌和生命压抑现象的质疑，如果缺少了它们，这个形象就失去了作为文学典型存在的价值。正是这种含蓄深沉的意蕴暗示，将深奥寓于浅显之中，让读者感慨，让学者探究，从而使该人物形象上升到一个哲理层面，即作家是在借助一个普通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一种普遍的人性思考：人类只有通过对自身既认同又反思的复杂认知过程，才能彰显其生命的本体意义。

小人物形象蕴含的批判意识涵盖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批判意识，二是文化批判意识。社会批判意识是以往文学批判精神的继承，尤其是对浪漫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小人物形象问世之前，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先后出现过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文学思潮。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先后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了19世纪这几种文学思潮已是余音缭绕。但是18世纪讽刺作家的作品中对现实的批判因素，感伤主义为底层民众啼饥号寒、间接抨击现实的抗争情绪，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小人物形象批判精神的形成。启蒙作家习惯以文学为武器参与现实斗争，通过对现实生活作真实而有哲理性的描写，达到分析批判现存制度的目的。这种传统被现实主义作家（小人物形象的塑造者）继承并发扬光大，表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19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十二月党人”诗人的浪漫主义诗歌促进了浪漫主义批判精神的高涨，在这种批判精神的基础上，随着农奴制危机的加剧，现实主义作家对腐败的农奴制和利己主义泛滥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无情的暴露。他们在反映生活时，不回避阴暗面，敢于披露社会真相，探索罪恶根源，并予以坚决抨击，从而为人们认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现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形象材料。

社会批判意识是现实主义作家面对衙门的昏暗和民众的苦难所激起的愤懑情绪和良知意识的体现，是他们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产生的以对权力的监督批判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意识的体现。他们不仅是作家，也是俄罗斯不泯的良心。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在肆虐无忌的权力面前的无力与无奈。换言

之，权力的任意滥用对于个人命运的戏弄与践踏，使他们痛心疾首。因此借助小人物形象的描写来表现他们的使命意识和公民意识，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社会批判意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写作目标锁定在对践踏人权行为的口诛笔伐上。面对民主的匮乏，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在小人物一边，把关注民众的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作为创作旨归，把表达人本主义和主张重建人文精神作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这使他们的作品既具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意义，又使他们直到今天仍然属于全人类。

文化批判意识揭示的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引发的文化变革阵痛，旨在反思存在于小人物身上固有的思想缺憾和行为弊端，目的是完成其人格形态批判，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塑造小人物形象的特殊意义。19 世纪初期，俄罗斯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以个体意识为核心的价值观逐渐产生，这构成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以集体意识为核心价值观的异质性因素。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小人物的人生价值究竟该如何体现，自然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于是把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作为新的价值理念引入小人物形象之中，从而使小人物形象的文化批判意识由于超越了简单的道德伦理和阶级对立模式而具有重要的社会认识意义和文学审美价值。

宗教弥赛亚意识作为小人物形象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是通过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联系来实现的。纵观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小人物形象所表现的宗教救赎思想几乎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因此，“舍弃了宗教特征，就无从准确完整地理解俄罗斯文学。始终面向终极，面向永恒，关注人生的意义、世界与人类的终极命运问题，是俄罗斯文学的价值与魅力所在。这，正是一种宗教精神。历经千年积淀，宗教意识已化为俄罗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内核。俄罗斯文学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宗教精神，东正教思想的核心就是对末世与救赎的深情眷注”^①。

① 梁坤：《末世与救赎：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俄罗斯自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宣布接受东亚教为国教以来,东正教在俄罗斯一直有很强大的势力。民众对宗教的热情远远超出其他欧洲国家,这从俄罗斯古典文学典籍几乎全部是用教会斯拉夫语记录下来的宗教性质的作品已经得到了证明。到了 19 世纪初,俄罗斯政教分离的呼声既来源于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又极大地促发了社会宗教情绪的高涨,这不能不在描写小人物形象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不过,小人物形象所蕴含的宗教意识却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宗教意识、文学意识和现实生活的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正如我国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学者王智量先生所说:“如果我们说 19 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学中哪位作家哪部作品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它必定是带有某种宗教气息的,因为这种宗教气息是俄国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① 不仅如此,宗教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还通过基督教的博爱与宽恕精神转型为文学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意识。这一点,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可以为证,巴什马奇金这位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二位小人物形象,便是笼罩在宗教氛围之中的文学形象。

双重人格所表现的自我确认困惑主题,主要是通过小人物形象进行自我剖析过程的揭示来实现的,凸显的是小人物形象深层心理机制的内在秘密。表面上看,双重人格是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形式,是受不良的外界环境和不适当的教育方式影响所形成的特殊心理个性,“是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其主要表现形式为阴阳性格、正反性格、明暗性格和显隐性格,等等。其中的“阴、反、暗性格基本上是潜意识下的贬义性格。隐性性格指的是中性……阳、正、明、显的性格是指当前显而易见的特征性的个性、性格,这个性格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心理疾患的患者,其病因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是内因,是心因,是心理素质中的缺陷……这种缺陷使患者极其苦恼,而且患者往往难以自觉,常不明其所以然,致使心理发生严重变异、矛盾冲突,以致发

^① 王智量:《论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4 页。

展成为心病，成为病态心理……”^①

但是，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的双重人格却与这种生理和心理疾病大异其趣、大相径庭。它着重强调的是人格的分裂与异化和人性的荒诞与怪异，它既是个体对外部环境的独特认知过程，又是内在心理的特殊结构形态。它以小人物形象独特审视世界的眼光来再现作者的创作主旨和美学理念，即世界首先在小人物的眼中是什么。尽管双重人格并非小人物形象的主流性格特征，但它却以其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了一个社会阶层的觉醒过程和封建意识羁绊下心灵备受煎熬的痛苦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物形象的双重人格，其内在结构形态表现为逐步递进的层次特点，即双重人格——自我意识——人本主义的层次特点。探讨这种“不受欢迎”的双面人的意义在于，促使小人物形象实现改变自己的愿望，“让自己发展为一个更好的人”。

人性否定意识，是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的深刻主题，显示了对以往小人物形象主题的超越。人性否定意识，以展示小人物形象的人性恶为突破口和切入点，在思辨中突破了对小人物给予盲目同情的思维定式，统一于更高价值层面的观照之中，其根本立意在于对“善”自身辩证的否定因素。从社会身份定位看，小人物形象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在情感认同层面上，更多地放大了被同情、被怜悯的成分，这样，就使其自身的弱点或劣根性被掩盖了。契诃夫的深刻之处，在于透过表面现象洞察了问题的本质，即通过小人物形象表面上的弱小、可怜透视的是其灵魂深处隐藏的城府意识——既是俄罗斯民族国民劣根性的体现，又是人类共有的人性恶的体现。

不仅如此，人性恶的否定意识，还展示了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的哲理沉思。小人物形象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是被同情与怜悯的对象，但是，这一形象又是庸俗角色的扮演者，这就构成了小人物形象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受生命本能等人性恶的驱使，心灵深处的唯利是图、趋势趋恶心理难

^① <http://wenwen.soso.com/z/q151403677.htm>.

以根除；另一方面，通过示弱、低调、忍耐等手段，使其既得利益显得合理合法。一方面是专制体制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又是受害者。在这样的“情感与理性”“善良与邪恶”的辩证关系中，小人物形象揭示的是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以及在由小我走向大我过程中的艰巨性。通过对小人物形象人性恶的否定，不仅打破了依托外在社会地位来分配作者“同情”的确定惯例，而且体现了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人类存在方式的忧患意识，从而阐明“永远地寻求发展”和人本主义的有机联系。

小人物形象的问世是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客观因素看，小人物形象的出现是西欧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和俄罗斯封建文化撞击后在文学上产生的结果。随着西欧启蒙文学和现实主义之风吹进俄罗斯文学殿堂，使19世纪俄罗斯文学逐渐摆脱了古典主义的固有模式，而步入了现实主义的新天地，于是出现了开启文学新思路的新型文学形象，小人物形象正是在这一特定时代氛围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现实主义鲜明特征的文学典型。

从主观因素看，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有一颗同情民众疾苦的善良之心和强烈关注俄罗斯社会现实的使命意识。他们深知文学在俄罗斯思想界和国民意识中的重要地位，这为他们创造性地塑造出能表现时代发展特征和底层民众精神状况的小人物形象提供了动力源泉。在小人物形象的具体刻画上，他们始终坚持文学表现生活的创作原则。运用个别概括一般的方法，并通过这种方法反映时代风貌，揭示生活本质。当然这种方法绝不意味着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发展，不断超越，从而使小人物形象既是一个整体文学群像，又是各自独立的文学典型。

不仅如此，小人物形象的出现也是民众对作家寄予殷切期望的结果。19世纪30年代以后当西欧资本主义的金钱统治抹去了文学家的灵光时，在俄罗斯“诗人的头衔、文学家的称号”却“使灿烂的肩章和多彩制服黯然失色了”。这是因为，俄罗斯的读者“把俄罗斯的作家看成自己唯一的领袖、摆脱俄国专制统治、正教、国粹主义的保卫者和救星”（别林斯基语）。民众爱戴作家，盼望优秀作品问世，成为作家塑造具有现实启示意义的小人物形象

的强大艺术动力。

小人物形象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经历了由产生到发展变化的过程。从 30 年代普希金塑造的第一个小人物形象——萨姆松·维林开始，到 40 年代果戈理笔下的巴什马奇金形象的出现；从 50—60 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杰符什金和“地下人”等性格复杂的小人物形象，到 19 世纪末契诃夫创作的以小官吏、小职员为代表的小人物形象。在这些小人物形象中，既表现了作者情感经历的演变——由同情到嘲讽到抨击的态度变化过程，又表现了作者在小人物形象中寄寓的有关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意识、社会权力反思意识、自我确认困惑和人性否定意识，以及宗教弥赛亚意识的深沉话语言说。

历史已经进入新的时代——21 世纪，似乎已渐渐地远离了 19 世纪俄罗斯那个有着特定历史含义的时间范畴。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所蕴含的复杂感情和深刻内涵似乎也在历史的尘封中已经回归寂静、成为往事。但是，当我们沿着小人物形象的足迹走近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去领略、去体悟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时，则不能不由衷地赞叹一百多年前他们塑造的小人物形象在今天的时代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在俄国社会转型期借助小人物形象所开创的人本主义、公民意识、批判激情和宗教精神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作为一面消失了的世界的镜子，不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它都将给我们提供某种启示和借鉴，它都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并改造现实。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批判意识:普希金笔下的小人物形象	(1)
第一节 批判意识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渊源	(1)
第二节 社会批判意识	(17)
第三节 文化批判意识	(38)
第二章 宗教意识: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形象	(69)
第一节 主动忏悔的宗教意识	(70)
第二节 以德报怨的宗教意识	(89)
第三节 宗教意识的生成原因	(107)
第三章 双重人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形象	(132)
第一节 双重人格的特征解析	(133)
第二节 双重人格成因探源	(164)
第三节 双重人格的表现形式及其审美价值	(188)
第四章 人性否定意识: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	(209)
第一节 心灵隔膜形态下的人性否定意识	(210)
第二节 庸俗主题下的人性否定意识	(233)

第三节 趋势趋恶心理下的人性否定意识	(253)
结语	(268)
参考文献	(273)
后记	(282)

第一章 批判意识:普希金笔下的小人物形象

普希金笔下的小人物形象诞生于 1830 年。这年秋天,普希金以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创作并发表了五部短篇小说,结集为《别尔金小说集》,其中的《驿站长》以成功刻画十四等文官萨姆松·维林这个小人物形象而成为短篇名作。之后普希金于 1833 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青铜骑士》里又塑造了叶甫盖尼这个小人物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小人物形象以其开创性意义和鲜明的批判意识在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第一节 批判意识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渊源

小人物形象作为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艺术典型,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渊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初期俄罗斯和西欧诸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小人物形象的批判意识既与俄罗斯和西欧以往文学人物形象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又与俄罗斯和西欧社会生活、文化背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俄罗斯和西欧诸国文学与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

俄罗斯文化与文学为小人物形象的批判意识提供了适宜生长的环境和土

壤。从 18 世纪初期开始到 19 世纪前 25 年，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彼得大帝改革、18 世纪启蒙运动、1812 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和 1825 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一切为普希金笔下的小人物形象输送了先进的思想资源，成了孕育小人物形象批判意识的外在因素；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文学思潮则成为孕育小人物形象批判意识的内在因素。

18 世纪初期彼得大帝掀起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运动，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为俄罗斯文学与西欧文学顺利接轨奠定了基础，为“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批判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彼得大帝在“18 世纪前 25 年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变化，促成了许多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提出和对它们的讨论。俄罗斯与西欧的科学和文化接触，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①。俄罗斯自从摆脱了鞑靼人 200 多年的统治之后，一些进步贵族和有识之士试图改革求变。改革的具体行动开始于 17 世纪末，改革的内容包括创办学校、译介西方文学等。从 18 世纪初期开始，彼得大帝加速了改革的进程，他奉“棍棒政策”驱赶俄罗斯这架笨重的马车向欧洲文明迅跑。这一时期的改革举措包括创建工厂、组建海军、制造船舰、招聘外国专家、向西欧派出大批留学生。文化方面包括创办报纸、创办公众剧院、用行政手段削弱教会的势力和影响。军事方面，通过多年的对外战争，夺取了波罗的海海岸，打通了通向西欧文明的航道，并且在涅瓦河入海处建立新首都——圣彼得堡，以此作为瞭望西欧的窗口。彼得大帝改革的目的是期望俄罗斯以军事与经济巨人的姿态昂首于欧亚大陆，同时也期望俄罗斯这位巨人头戴科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桂冠。彼得大帝的改革手段虽然粗蛮强硬，但他的意愿却与俄罗斯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要求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愿望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理解与支持，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改革成效，整个社会掀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热

^① M. P. 泽齐娜、Л. B. 科什曼、B. C. 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7 页。